

引 言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大多数西方国家的政府都试图以制订法规、协商或说服的方法来影响本国工资和物价的发展趋势。这些干预都无区别地包括以下内容：工资和物价调控、收入政策、严厉政策或经济紧缩政策。当这些政府认为通货膨胀率过高了，特别是考虑到外国竞争时或通货膨胀增长过于迅速时，就产生了干预。直接对工资和物价进行干预，其目的是减轻通货膨胀的影响。如果物价能冻结住，也就没有了通货膨胀，至少表面上是如此。这种情况，有时人们称之为抑制性通货膨胀。

政府能够控制物价和收入水平的观念由来已久。浏览一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所取得的经验，可以更好地懂得传统上收入的政策该包括些什么。收入政策的前提是：当局制定在一定时期内物价和收入增长的目标或限度，以及当局取得雇主们、工会和各独立行业的赞同，并使他们能遵守这些规定。

作为收入的议定政策，由于迟早会产生放松控制压力的缘故，这种政府的干预一般持续时间都不会太长。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干预是无效的，即使是短期性质的，它足以能影响在没有干预的情况下物价可能发生的发展趋势。

许多年来 特别是战后经济迅速增长结束 失业现象增加，对这种政策的好处颇有争议，其他的政策被提出来了，其中包括拒绝一切干预。对就业的担心与物价稳定、分配公正的目标处于同等的地位。最终，收入政策概念本身失去了它的一致性，今天人们提出了各种形式的收入政策。

本书第一章介绍这些政策的历史。第二章至第七章介绍这些政策的理论根据及其范围。第八章至第十章则介绍收入政策所带来的经验。这些就是本书的主要内容。

第一章 收入政策的沿革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收入政策在下列四个历史时期中是具有现实意义的：战后阶段，60年代初期，1968年到1972年，最后是第一次石油危机后。当然，在那些收入政策享受有利因素的国家里，人们就能够正常地实施这些政策，但如我们看一看整个工业国家，仅仅是在这四个阶段中，收入政策才具有现实性。加之，60年代初所采取的企图属于愿望而不是需要，这点我们将在后面谈到。在其余三个时期，我们观察到运用收入政策是与国内和（或）国外严重的经济不平衡同时发生的。

一、战后时期

如果说美国和加拿大在战后有一个正常发展的经济局面，那么相反，欧洲各国的经济受到了严重的影响：生产能力大大地被削弱，人们缺乏消费资料，而想要进口设备资料以便迅速重建生产能力又被缺

乏美元——当时唯一坚挺的货币——所限制。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避免相对无弹性供给（人们无法在短期内生产得更多，缺乏外汇也无法进口）的过量的需求所导致的通货膨胀，就有必要控制总需求量。为了控制需求，许多国家都实施了有关工资、其他收入、以及物价的收入政策。在斯堪的纳维亚各国、荷兰、奥地利及英国都是这种情况。这种经过与雇主协会和工会协商而制订的政策，有许多理由被他们所接受。他们觉得为了分配可以自由使用的稀少的消费资料，收入政策是最公正的方法；为了恢复国家进口、投资的能力，从而创造就业的机会，这也是最有效的方法。然而，由于那时在农业方面存在着失业或就业不足现象，人们担心战前经历过的那种严重失业现象又会重现。另一方面，这些工会组织通常都与执政党关系密切。收入政策与定量供应措施结合，就能保证所有的人享有一定的消费水平。并且由于累进直接税制，每个家庭之间的差距不会太大。

相反 在法国和意大利 那里的政治条件不允许实施这样的政策，理由之一是共产党和与它有联系的工会的力量所产生的作用，因为这个党和这个工会坚决反对一切对收入政策赞同的意见。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是有关工资的要求，而生产者当局。特

别是耕作者和商人为了提高他们产品的价格而不顾国家的控制政策，这样就导致了通货膨胀的进程，结果造成了工资普遍指数化和严重的物价工资的螺旋上涨所维持着的通货膨胀。

二、60 年代初期

60 年代初期，世界上没有出现严重的经济不平衡，因此形势并没有迫使人们制订收入政策。简单地说，战后第一次国际竞争起了充分的作用，特别是在生产资料方面是如此，在欧洲和东南亚形成了新的生产能力，人们在世界范围内使贸易自由化并建立了欧洲经济共同体。从此，物价的竞争限制了与外贸平衡相适应的生产成本的上涨。而同一时期大多数工业国已接近充分就业，这就有利于提高工资的要求。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维持物价平稳和外贸平衡，收入政策就像是预算和货币政策的适当的补充。问题在于它影响工资协商中谈判对手的主张和态度。从这一意义上说，收入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公共关系活动。人们期望协商各方能共同自愿地采取制止物价和工资上涨的措施，涉及这些决定的人们能懂得通货膨胀失去控制所带来的弊病，并且舆论

的力量能动员起人们来反对工资和利润无节制地上涨。就这样，参照生产力作为收入发展趋势的准则进入了大众传播媒介和舆论之中。这一准则建立在当货币收入总数不超过总生产的增长时，物价总是稳定的原则之上，用简单的话来说，也就是：只要雇佣劳动者的平均收入不比平均劳动生产力增长得更快，就可以避免通货膨胀。

在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各国，这个准则的目的是避免超过生产力的工资增长使这些国家在美国、德国和日本的面前失去他们的竞争力。而在这三个国家里，提高工业产品价格的压力较小。在其他国家，特别是在美国和德国，在保持物价平衡的同时能达到充分就业。

在美国，人们最多援引生产力这条准则。在斯堪的纳维亚各国，人们致力发展起重要作用的三方集体协商形式（工会、雇主和国家），在德国，人们投入了“一致行动”。在英国，物价和收入委员会让人们从微观经济角度认识到生产力的发展情况。在所有这些国家里，这些行动在不同的形式下都有同一目的：告知民众实际收入的增长率，而这是与物价的稳定和外贸平衡一致的。这一政策受惠于原材料价格下降的发展趋势：事实上，与生产力上升一样的工资增长，可以在稳定工资和增加少量利润（或是对企

业征税)之间取得一致。

三、1968 年的动乱及其后果

这一时期的特点是经济严重不平衡和社会动乱，这一切引起了工资剧增，导致众多国家的政府以冻结收入和工资这样的紧急措施来予以抵制，即使当时他们原则上是不赞成这么做的。两个主要的事件并不是独立的（同样的左派领袖在欧洲组织了反对越南战争的罢工和示威游行），一个是 1968 年 5 月在法国发生的事件，另一个是越南战争。1968 年 5 月的示威游行增强了其他欧洲国家工会和雇佣劳动者的战斗性。此外，工会的负责人对左派领袖无能为力。这样，政府和雇主们宁愿接受通货膨胀工资的上涨而不愿经受与法国一样严重的动乱。

另一方面，由于越南战争升级，美国不得不对预算赤字提供大量资金，并以外贸不平衡的代价进口大批的生产资料。这种进口有利于国际价格的提高，这是自 1951 年朝鲜战争以来人们所没有经历过的事。

这些事件与工资上涨的其他因素相关联。在欧洲，由于多种原因，在许多国家里从全国范围到企业范围内都进行了工资协商：由于充分就业的形势，雇佣劳动者不用担心失去他们的职业，另一方面他们对

全国工会联合会所提出的要求的温和性深为不满。他们甚至以罢工来威胁，毫不犹豫地要求大幅度地增加工资，并认为企业能接受他们的意见而不致于破产。（实际上，当这企业是它市场的领袖时，它是准备让步的，因为它知道其他的企业将会追随它的销售价格）在工资方面的调和受到货币限制减弱的鼓励：国家之间大量资本的运动受到利率差距的促进，有时会带来货币流通量的迅速增长。

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两次相继的工资快速高涨高潮：一次是 1968—1970 年，另一次是 1972—1973 年。这两次高潮与对国际市场的需求和物价的突然上涨相联系。一方面，这种上涨是由于担心发生社会混乱和在美国因越南战争引起的过分的需求，另一方面，这是大多数工业国家在 1971 年底至 1972 年初针对 1970—1971 年度限制需求和物价而采取的扩张主义措施的后果。

各国政府求助于收入政策以便减慢工资增长的速度。在美国和加拿大，这一政策仅被看作是推翻对物价上涨预测的短期性干预。事实上在这些国家，如同在欧洲，工资要求是由这些对经济前景的预测所维持的。相反，在欧洲各国，人们把工资增长看作是政治性质的结构现象：它是各集团之间有关国家收入分配争议的结果，特别是在想要牺牲利润来

增加工资部分的雇佣劳动者和想法正好与他们相反的企业头头之间争议的结果。从那以后，收入政策似乎就成了各集团之间有关国家收入分配达成和解的唯一手段，同时避免了公开的政治和经济冲突。

为了遏制工资增长或打破物价工资螺旋式上涨，各国政府强制性地作出了限额规定。这样，英国在 1968 年 3 月规定工资和股息每年上涨最高数字为 3.5%，然后 1969 年 12 月规定新的标准为 2.5—4.5%。1972 年 11 月则决定对工资、房租、物价和股息冻结三个月。在荷兰，1971 年政府规定了工资增长的最高限度。1972 年 12 月则在社会各集团之间对收入的发展趋向达成了一致意见。在加拿大，一物价和收入委员会为 1969 年的收入上涨制订了标准。各工会反对此举，但各大企业在 1970 年都遵守了有关物价上涨的这些规定。在美国，1971 年尼克松政府决定冻结所有的物价、工资和利润 3 个月，随后 1972—1973 年实行了控制措施。有丹麦和瑞典，1970 年末至 1971 年初实行了物价冻结。在挪威，1971 年也对物价和工资采取了同样的措施。在法国，1971 年末至 1972 年初加强了对物价的控制。在整个欧洲，像德国或瑞士这样实际上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控制或冻结物价和（或）工资的情况是很少的。

这些政策 1973 年的总结是相当令人悲观的。

在好几个国家放弃执行这些政策后，许多人提到了失败这个字眼。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作出一半失败的结论更正确些。首先，由于世界物价的上涨国际形势不利于实施收入政策。众多经济计量学研究，试图比较无干预执行这些政策的各个时期，然后评价这些政策的效果。这些研究的结论不是最后的结论，尤其是因为结论没有考虑到物价和收入形成中的制度变化的后果。美国的经验引来了许多分析研究。人们一致认为收入政策制止了 1971 年和 1972 年的通货膨胀，而对 1973 年的物价没有任何效果，那时人们对控制放松后又加强了。尽管如此，收入政策缓和了工资上涨的速度，1973 年比 1972 年上涨势头小得多。如果我们看一下 1968 年和 1973 年间采取这一政策的所有国家的情况，那么，如果说通货膨胀的速度丝毫没有放慢的话，但这些政策似乎对经济前景的预测和社会冲突产生了有利的影响。加之，当人们拒绝采用收入政策，这些冲突就加剧了。从这一意义上说，收入政策在许多有利因素存在时期内缓和了社会和政治冲突。

四、第一次石油危机的反应

1973 年末的石油危机，伴随着原材料价格的暴

涨引起了许多国家通货膨胀率超过了 10%。其后果是社会冲突加剧，因为每个集团都尽力要维持它的生活水平，这就使既要保持外贸平衡，又要使总的需求与供给能配合起来的一切管理工作发生了困难。实际上，为了避免价格的上涨，石油和原材料价格暴涨要求增值与生产的比率下降，也就是说要减低工资和企业的利润。

然而，这种调整由于许多国家（如比利时、丹麦、法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英国）现行的工资指数化条款而变得不可能。在这些国家里，石油和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加速了生活费用的上涨，随之而来的必定是工资的提高。而在没有工资指数化的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日本和德国都避免了这一损害出口竞争性的加速通货膨胀过程。

另一方面，在斯堪的纳维亚各国或英国，过重的累进直接税产生了反常的效果，因为人们没有从税率表中选择有利的税项以便完全补偿通货膨胀所造成的损失。由于工资要求与征税后的收入有关，税收加重导致税收超过生活费用的增长前要求提高工资。

各国对石油冲突的反应因下列各因素而异：不易被通货膨胀损害的国家没有采用收入政策，这与其他一些国家不同，这些国家视收入政策为短期性

的一种策略，它能以更少的冲突而更迅速地制止通货膨胀。第一世界包括三个最大的经济大国：美国、日本和德国以及瑞士。这些国家的劳动成本是有伸缩性的（除了瑞士，那里部分指数化在起作用），它们接受可能低的就业率，在德国和瑞士则表现为辞退外国劳动者。最终，这些国家很容易地接近资本的国际市场，以便能吸收资本。

相反，其他国家常常短期地求助于物价调控或工资调控措施。比利时、荷兰、斯堪的纳维亚各国、法国、奥地利、英国和加拿大都是这种情况。大体上说，在这些国家里工资增长比没有采用收入政策的第一世界国家要利害，对外往来存款的发展趋势不大有利，失业情况相似（在失业者中包括被遣返回国的外国人）。当然，为了判断收入政策的效果，必须提醒大家，收入政策仅是其他政策，如预算和货币政策中的一个因素。因此，这些政策的成果取决于相互之间紧密相联的各措施的总体。但是，如在 1977—1978 年，这种效果在许多放弃收入政策的国家里显得可疑了。这不排除间接的努力，比如，人们确定了一个与物价少量上涨相容的货币流通量增长的目标，或在公职范围内限止工资的提高。但对收入总体进行控制的计划不再成为议事日程上的事。在这点上意味深长的是，作为物价管理最有利

的国家之一的法国，却在 1978 年放弃了这一做法。当然，在 1982 年为了制止由于 1981 年所采取的措施加剧了的通货膨胀，又重新建立了物价管理制度。但在 1983 年，与物价相比，部分工资非指数化。1986 年，物价管理似乎是最终被取消了。

第二章 收入的议定政策

一项收入政策（更通常地说是国家在经济活动中的干预）的理论根据必须以经济总的运转的表现为依据。因此，令人毫不惊讶的是，对物价和工资进行调控并通过这种调控，进而调控收入水平，以便限制通货膨胀的危险的想法历来是与标志着现代经济思想发展进程的争论的开展相联系的。

按照某一方法，我们可以把思考的起点定在 1936 年凯恩斯的《通论》的出版上 因为与新古典主义传统相反，凯恩斯坚持经济不会自发趋向充分就业平衡，而国家可以通过适当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来减少失业现象。但 1940 年和 1950 年之间的辩论导致了一综合模式的产生，这一综合模式是用允许当局通过间接提供货币的货币部门来补充凯恩斯的平衡方案。但此模式把劳动市场排除在外，以致使工资成为外来的变数。从那以后，新古典主义传统的支持者坚持认为，如果工资如同物价一样“有伸缩性”并且下降、上涨变化很迅速 对各市场上供求之

间的不平衡作出相应反应，那么经济就会自发地趋向充分就业的局面。相反，凯恩斯们表现得很谨慎，看到短期内低工资的严峻性，甚至存在严重的失业现象，同时也观察到工会组织的影响，因此需要有一种积极的政策，以保证充分就业，即使此政策有可能使通货膨胀加剧。然而，不同学派对通货膨胀的根源有不同的解释，或者就是对其进展有不同的描述。根据现有的观点，对工资和价格实行调控并不具有同样的理论根据。

一、议定政策的理论依据

新古典主义经济的传统观点认为，在价格和工资都是有弹性的竞争市场中，其上涨现象的根源只能是由于存在“求”过于“供”。价格水平相对长时间持续的普遍上涨只能被解释为是一种需求膨胀。当然，此现象的概论假定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者是能够以总是上升的价格来支付这些费用的。因此，他们永远有足够的货币可支配。通货膨胀最后被分析为一种货币现象，此现象是由于货币提供的过度增长而引起的，这一增长有可能被不同经济因素上涨的预测所代替。这种更新旧的货币量的理论的说法想必在 19 世纪 70 年代被货币学派所发展。问题很

清楚，与价格普遍上涨作斗争主要属于货币政策，并不能求助于工资和价格的调控。

1. 工资增长引起的通货膨胀 —— 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四分之一世纪期间，那时占统治地位的凯恩斯思潮一般都归附到另一种名为成本膨胀理论的分析类型中去。

根据这一看法，决定价格和工资在很大程度上与对市场的供求作用互不相关。在这个结构与完全竞争的结构相去甚远的市场上，代理人或代理人团体（企业、工会）支配有一定的垄断权力，使他们能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报酬，而不管在不同的产品或劳动市场上的供求条件如何。与此相近的最为人熟知的一种应用理论以参加工会的劳动者的比例或百分比变化来解释促使名义工资上涨的原因。如果工会施加的压力使工资增长超过了生产力的利润，我们就会看到劳动成本的上涨失去控制，但劳动成本在总计划中代表生产成本（包括进口的原材料价格）的主要部分。成本失控迫使企业提高他们产品的价格，因为他们要保护自己的利润，而企业资金的投入和股东们的酬金都取决于企业的利润。

在成本膨胀分析中，劳动成本的演变是与工会影响的一览表（加入工会成员的比例、罢工的次

数……)相联系的。最高程度的解释可能是属于社会政治范畴(在阶级斗争范围内力量关系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需求的变化对价格没有直接的影响。防止和减弱通货膨胀的唯一方法只能是依靠一项特别是以工资调控为重点的收入政策。

然而我们注意到,工会不可能完全不知道来自劳动市场形势的限制,而且他们应在一定范围内在比较高的工资和工会会员失业现象之间起仲裁作用。工资和价格的普遍上涨事实上减少了流通货币量的实际价值,其结果是减少了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量,因而也就减少了对生产和就业的需求量。为了不出现这种情况,就需要金融主管部门同意将维持总是高涨的价格水平中的活动所需的一切货币提供给企业、家庭或行政部门;换言之,货币供应必须与价格水平一致,而不是相反。在这种情况下,货币量的增加成了通货膨胀的一种结果而不再是一种原因。这种观点假定保持充分就业是经济政策的优先目标,即使是要损害物价稳定也罢,价格和工资调控的目的正是尽可能地保护这种平衡。

2. 要求的实际工资 —— 但很难想象工会能用一种机制来产生持续不断的通货膨胀。如果政治形势和社会力量的关系突然朝着有利于雇佣劳动者方